

易经

YIJING YUFA FENXI

赵荣珣 著

语法分析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易經

YIJING YUFA FENXI

语法分析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经语法分析/赵荣珦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5326-3200-8

I. ①易... II. ①赵... III. ①周易—语法—研究 IV. ①B221.5②H1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6581 号

责任编辑 张玉霞
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易经语法分析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305 000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200-8/B·183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—62431119

序

最近，洛阳赵荣珣先生以大作《易经语法分析》垂示。据我孤陋所知，海内迄今尚无同类专书面世，仅此一端，已足见其筌路蓝缕之功。《易》曰：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”知者，智也。赵先生，智者夫！

展读之余，我有以下三点感想：

一、何谓“《易经》语法”？

我们知道，《周易》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：一是成书于西周的《周易》古经，即通常所谓《易经》；二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《周易》大传，即儒家称作“十翼”的《易传》。赵先生的《易经语法分析》，就是对前者的语法现象的研究。

具体说来，所谓“《易经》语法”，就是《周易》古经的筮辞（卦辞、爻辞）的语法。该文本中的语法现象是很丰富的，赵先生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：

词法方面，赵先生是既讲词性，也讲词义。我想，大约是这个原因：虽然词义（这里不是指的语法意义，而是指的词汇意义）本来不属于语法学范畴，而属于语义学范畴，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词语来说，如果不能确定其词义，也就不能确定其词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语法乃是语义的一种表现，语法是功能性的，而语义才是实质性的。

句法方面，赵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。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，他首先对卦辞、爻辞进行了“主—谓”二元结构的分析，即将卦名、爻题视为第一层次的主语。这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卦辞、爻辞作为占断，是对卦名、爻题的意义的断定。例如乾卦：“乾：元亨，利贞。”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即：

乾卦：|| 大通，有利于占问。

显然，“元亨利贞”是对“乾”的断定，这是主谓关系。其实，传统易学已经指明了这种关系，因为像“元亨利贞”这样的筮辞，被称之为“彖辞”；彖者，断也；断也者，断一卦之吉凶也。

不仅如此，《易经》语法的意义远不限于《周易》本身。整个《周易》语法乃是中国轴心时代（Axial Period）的汉语语法的代表形态：《周易》古经的语法是殷周之际的语法代表，《周易》大传的语法是战国时代的语法代表。赵先生的《易经语法分析》就是对以《周易》古经语法为代表的殷周之际汉语语法的研究，这里显示出赵先

生的独到眼光：研究殷周之际的汉语语法，《周易》古经是最恰当不过的文本选择。这是因为，其他文本在时代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疑问的。例如《尚书》中的《商书》和《周书》，由于“伪书”混入的问题，我们很难甄别它们的确切时代，因而很难加以利用。而《周易》古经的时代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它是西周初期的文本，因此，它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殷周之际的语法的范本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所谓“《易经》语法”就是西周语法乃至殷周之际的语法。因此，像赵先生这样的对《易经》语法的研究，乃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必由之路，是汉语史研究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。

二、如何研究《易经》语法？

汉语语法研究，由来已久：传统语文学（philology）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，大约肇始于元代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讨论文言虚词的专著，是卢以纬的《语助》，而所谓“文言虚词”，依我的看法，其实质乃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（词法形态、句法形态）；现代语言学（linguistics）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，滥觞于晚清，第一部专著，是近代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。后者实际上是用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律来硬套汉语的语法，结果带来许多类似“格义”的弊端；但是，我们显然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前者去。时至今日，这仍然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困惑：我们缺乏本土的、原创的、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的语法理论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，停止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；唯一的选择，就是只好暂时仍然采取“以西说中”的办法。这就犹如当年的佛学东来，最初的理解虽然扞格不通，但正是经过这样的“格义”，佛学才最终被中国化、本土化了，形成了中国原创的佛学。

赵先生的《易经语法分析》即属于这样的“以西说中”，虽属“格义”，也是眼下别无选择、而必须勉力从事的历史阶段性的任务。那么，按西方语言学的观念，《易经》语法研究涉及两个方面，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：一方面，研究《周易》语法必然涉及与其前后时代的语法的“历时”比较问题，这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；但另一方面，《周易》语法本身的存在却是“断代”的，我们首先必须“共时”地去描写它，这就可以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。两者之间，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：一方面，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，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每个时代的共时的语法结构特征，才可能对它们进行历时的比较；但另一方面，前者也是后者的条件，因为假如不对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进行历时的比较，我们也很难找出一个时代的语法的共时特征。因此，现时语法学界把这两种研究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。

赵先生的《易经语法分析》就是一种共时的研究，即是对殷周之际的语法结构的静态描写。这种共时的静态描写当然应该在历时比较的条件下进行，但这种共时描写的结果本身又对历时比较的研究提供基础。例如，古经语法的研究可以与

大传语法相比较;然后,比较的结果又可以用于对大传语法的更进一步研究。赵先生这样对《易经》语法进行共时研究,就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赖以比较的基础;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古经与大传的语法比较,而且意味着殷周之际的语法与战国时代的语法的比较,从而构成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的一环,这是很有意义的。

三、研究《易经》语法有何意义?

前面实际上已谈到了《易经》语法研究本身具有的语法学、语法史的学术意义,此处不再赘言。我这里还想谈的,则是《易经》语法研究所具有的超越了语法学及语言学的更为一般的意义。

我想,我们今日研究《周易》,绝不是为了“发思古之幽情”,更不是为了满足古董商、收藏家那样的嗜好;我们今日研究《周易》,乃是为了先儒所说的“通经致用”,今人所谓“古为今用”,也就是《易传》所说的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。通经者,正德也;致用者,利用厚生也。然而,非通经则无以致用;通经者,所以致用也。因此,首先是要通经。

那么,何谓通经?为什么要通经?所谓通经,就是读懂《易经》;通经的直接目的,是为了理解“圣人之意”,而其最终目的,则是利用厚生。《系辞传》说:

子曰: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”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?子曰:“圣人立象以尽意,设卦以尽情伪,系辞焉以尽其言,变而通之以尽利,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”

这里,“立象”、“设卦”是指《易经》卦爻的符号系统;“系辞”是指《易经》的语言文字系统,亦即赵先生所研究的筮辞。通经就是首先弄通筮辞之意,由此弄通卦爻符号之意,以至弄通圣人之意,进而正德,进而利用,进而厚生。

这也是赵先生《易经语法分析》的最终意义所在;而其直接所关的意义则是:如何才能通经?古人有言,通经必自通小学始。所谓“小学”,乃是古人对传统语文学的称谓。自刘向、刘歆父子《七略》、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至《四库提要》以来,“经部”必录“小学”之目。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:通经的前提是通该经的语言文字。试想,假如连书都没有读懂,假如连书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弄通,如何可能通经?如何可能理解圣人之意?又如何谈得上正德、致用?这正是今日学者中的一种大病:即以《周易》研究来看,或者望文生义,或者游谈无根。当然,关于《周易》的训诂之类的小学研究,自古至今,不绝如缕,但对《易经》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“语法分析”的专书,恐怕前无古人。

按照传统的称谓,赵先生的《易经语法分析》即属于所谓“小学”:它是我们读懂《易经》的前提,也是我们通经致用、利用厚生的前提。我想,这就是赵先生《易经语

法研究》的最大意义所在吧！

承蒙赵先生不弃鄙陋，命我为序；而我对《周易》语法素无研究，实在惶恐之至。然而有感于赵先生“通经”之志，故本乎《周易》“修辞立其诚”之意，拉杂如上，以就教于赵先生并海内学人，或有未达，幸见谅焉。

黄玉顺

于 四川大学 竹林村

目 录

阅读凡例	1
绪论	1
一 乾	13
二 坤	17
三 屯	21
四 蒙	25
五 需	29
六 讼	32
七 师	36
八 比	39
九 小畜	43
十 履	46
十一 泰	49
十二 否	53
十三 同人	56
十四 大有	59
十五 谦	62
十六 豫	65
十七 随	68
十八 蛊	72
十九 临	75

二十 观	78
二十一 噬嗑	81
二十二 贲	84
二十三 剥	87
二十四 复	90
二十五 无妄	94
二十六 大畜	98
二十七 颐	101
二十八 大过	105
二十九 习坎	108
三十 离	112
三十一 咸	116
三十二 恒	119
三十三 遯	122
三十四 大壮	125
三十五 晋	129
三十六 明夷	133
三十七 家人	137
三十八 睽	140
三十九 蹇	144
四十 解	147

四十一	损	150
四十二	益	154
四十三	夬	158
四十四	姤	162
四十五	萃	165
四十六	升	169
四十七	困	172
四十八	井	176
四十九	革	180
五十	鼎	184
五十一	震	188
五十二	艮	192
五十三	渐	195
五十四	归妹	199

五十五	丰	203
五十六	旅	207
五十七	巽	211
五十八	兑	215
五十九	涣	218
六十	节	222
六十一	中孚	225
六十二	小过	229
六十三	既济	233
六十四	未济	236
参考书目		240
后记		242
再记		244

绪 论

《易经》，殷周时期的百科全书

《易经》成书于西周初年，因此又名叫《周易》。但它形成的经过，据估计大概用了千年以上的时间。据考证，它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，而最后成书时，已经用当时最简练的语言，采用记叙、描写、说明、议论、判断的表现手法，组词造句，表达出完整的意思，与早已存在的卦划相配合，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。在当时来说，是一部不足五千字的通俗易懂的书，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荟萃，堪称一部殷周社会百科全书。

相传，在六千五百多年前，河洛地区出现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（数字图书）。到六千多年前，有一个叫伏羲的人，从西北的天水到了中原的河洛地区，他看到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以后画了八卦（又称单卦、三划卦），那时只有符号，没有文字名称。

又相传，后来，伏羲把八卦相重变为六十四卦；又有人说是神农、夏禹、文王重卦。反正六十四卦出现了，究竟是谁重的卦，说不清楚。所谓重卦，就是一个三划卦先与自身相重（加），再与其他七个卦的三划卦相重（加），得出的卦叫重卦（由三划卦相叠而变为六划卦），也就是八八六十四卦。这是数学上的排列组合，足见我国先民的高超智慧。六十四卦当时也是只有卦划符号，没有文字名称。

下面所附的六十四卦成卦图，就是根据以上情况模拟出来的，为醒目起见，把每卦卦象相对应的文字名称同时标出以便阅览：

六十四卦成卦图

	天 ☰	泽 ☱	火 ☲	雷 ☳	风 ☴	水 ☵	山 ☶	地 ☷
天 ☰	☰ 乾	☱ 履	☲ 同人	☳ 无妄	☴ 姤	☵ 讼	☶ 遯	☷ 否
泽 ☱	☰ 夬	☱ 兑	☲ 革	☳ 随	☴ 大过	☵ 困	☶ 咸	☷ 萃
火 ☲	☰ 大有	☱ 睽	☲ 离	☳ 噬嗑	☴ 鼎	☵ 未济	☶ 旅	☷ 晋
雷 ☳	☰ 大壮	☱ 归妹	☲ 丰	☳ 震	☴ 恒	☵ 解	☶ 小过	☷ 豫

(续表)

	天 ䷀	泽 ䷬	火 ䷔	雷 ䷏	风 ䷭	水 ䷜	山 ䷳	地 ䷁
风 ䷭	䷀ 小畜	䷬ 中孚	䷔ 家人	䷏ 益	䷭ 巽	䷜ 涣	䷳ 渐	䷁ 观
水 ䷜	䷜ 需	䷬ 节	䷔ 既济	䷏ 屯	䷭ 井	䷜ 坎	䷳ 蹇	䷁ 比
山 ䷳	䷜ 大畜	䷬ 损	䷔ 贲	䷏ 颐	䷭ 蛊	䷜ 蒙	䷳ 艮	䷁ 剥
地 ䷁	䷜ 泰	䷬ 临	䷔ 明夷	䷏ 复	䷭ 升	䷜ 师	䷳ 谦	䷁ 坤

大概到殷周时期(或其以前),出现了文字以后,人们才给八卦(三划卦)配上了文字名称,叫做: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。具体的含义分别是: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

后来,六十四卦符号也配上了文字名称,并分了上下经。上经三十卦是:乾、坤、屯、蒙、需、讼、师、比、小畜、履、泰、否、同人、大有、谦、豫、随、蛊、临、观、噬嗑、贲、剥、复、无妄、大畜、颐、大过、坎、离。

下经三十四卦是:咸、恒、遯、大壮、晋、明夷、家人、睽、蹇、解、损、益、夬、姤、萃、升、困、井、革、鼎、震、艮、渐、归妹、丰、旅、巽、兑、涣、节、中孚、小过、既济、未济。(说明:1. 八单卦各自相重以后的重卦文字名称,与八单卦的文字名称是一致的。2.《易经》六十四卦先后顺序的编排标准是什么,至今不明。)

南宋易学家朱熹编了一首《八卦取象歌》:

三乾三连,三坤六段。三震仰盂,三艮覆碗。
三离中虚,三坎中满。三兑上缺,三巽下断。

他还编过一首《六十四卦次序歌》,因为没有反映出卦与卦之间的关系,清代学者金圣叹曾作了重订,但我仍感到不足,特又拟了这首《新订六十四卦次序歌》:

乾坤屯蒙需讼兮,师比小畜履泰否;
同人大有谦与豫,随蛊临观噬嗑贲;
剥复无妄与大畜,颐大过兮坎与离;
正对六卦反廿四,是为上经三十备。

咸恒遯与大壮兮,晋与明夷家人睽;
蹇解损益夬与姤,萃升困井革鼎继;

震兮艮兮渐归妹，丰旅巽兑涣节配；
中孚小过既未济，三十二反二正对；
是为下经三十四，研易君子要牢记。

上经正对六卦，又叫错卦：乾、坤；颐、大过；坎、离。其余二十四卦为反对卦，又叫综卦。下经正对二卦：既济、未济；其余三十二卦为反对卦。如果按照错综卦的次序排列，上经 $6 + 12 = 18$ 卦；下经 $2 + 16 = 18$ 卦。

至于八卦与六十四卦符号匹配文字的名称，是否在同一时间，当时还有具体的什么含义，就说不清楚了。

考古资料发现，殷代及其以前，甲骨、陶器上所刻的一次性卦划符号，都是六划卦，也就是所谓的重卦；而三划卦，也就是单卦，到了西周及其以后，才出现在甲骨及其他器物上。除了极个别与当今《易经》爻辞不同以外，都没有卦爻辞。从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先有重卦，后有单卦，如何解释，尚待研究。

后来，在卦划上又配上了完整的卦辞和爻辞。

又相传，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禁于羑里城时而演《周易》，作了卦辞。

又相传，周公姬旦作了爻辞。

以上几种说法，是战国及其以后人的推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都没有确凿的文档证据，但是，《周易》毕竟出现了，而且是一部完完整整的书。六十四卦的符号配上了六十四个文字名称，每一卦的下面配有卦辞，每一卦的六个爻下面配有爻辞。这些卦爻辞的内容，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记录。每一卦六个爻的排列顺序说法是：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。编写《周易》的人，又把占卜定型用的“筮数九”和“筮数六”，分别并列在六个爻的旁边，以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的排列为例：

《乾》：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；

《坤》：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上六。

这两卦的“筮数九”、“筮数六”的顺序排列，还有点讲究，那就是“初”和“上”两个爻位的左边，配上筮数“九”或“六”，这叫先爻位后筮数，即读为“初九”、“上九”，“初六”、“上六”；其余二、三、四、五四个爻位，是先筮数后爻位，即读为“九二”、“九三”、“九四”、“九五”，“六二”、“六三”、“六四”、“六五”。其余六十二卦的爻位和筮数的排列顺序，依此类推。每个完整的卦（六划卦或叫卦象）下面，配上的文字叫“卦辞”；每卦六个爻，单另同时写出（或叫读出）每个爻位与筮数（如“初九”），在其下面，所配上的文字叫“爻辞”。

西周编写《周易》时，肯定有一套方案，卦爻辞与卦爻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，怎么个说法，这些具体的编写体例都失传了，后人想把它们弄个清清楚楚，也不可能了。

《周易》自从卦爻辞配上卦划以后，就成了一部完整的三千年前的殷周社会百

科全书。这些卦爻辞涉及政治、经济、人文、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历史等。而人文方面极其广泛,包括个人、家庭、家族(集团)、婚姻、伦理、教育、祭祀、征伐、诗歌、音乐、舞蹈等等。64卦卦辞和386爻爻辞,合起来有450项,可是,不只记录了450件事,如坤卦卦辞就记录的是三件事或四件事。清代大学者江永,在他所著的《河洛精蕴》一书的第五章《卦象考》中,对《易经》经文所记述的内容,做了细致具体的统计:

天文类(13种)、岁时类(19种)、地理类(41种)、人道类(31种)、人品类(10种)、人事类(43种)、身体类(37种)、饮食类(12种)、衣服类(4种)、宫室类(11种)、货财类(7种)、器用类(30种)、国典类(12种)、师田类(9种)、动物类(48种)、植物类(21种)、杂类(19种)等17类。共有367种。

三千年前的殷周社会文化生活,几乎包容殆尽。由此看来,《周易》的64卦386爻的卦爻辞,是作者把人们日常生活的17个方面的内容,曾经出现过的,或者人们传说过的,再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记录下来,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,缀在每卦、每爻的下面,并用是非吉凶判断语作结,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说,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记录存档了,谁如果遇到了哪一卦或哪一爻,一看卦爻辞,就知道是吉是凶,可行不可行。这就跟民间谚语一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:

云行东,车马通(不下雨);云行南,下满潭(下雨);云行西,老关爷骑马披蓑衣(下雨);云行北,干研墨(不下雨)。

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经验或历史事件的记录,并没有什么神秘色彩。我想,当时《周易》编好以后,很可能在民间流行了一段时间。

大概到后来,各朝政府把《周易》收了起来,作为国宝秘而不传了,只准掌握在王朝的少数叫做“卜人”的手中,又用繁琐的预测手法来检索、查看卦爻辞,于是就越来越神秘了。

《易经》的流传与注释

据《春秋》记载,《周易》是一部卜筮的书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周王朝有卜官,专掌“三易”之法:夏《连山》、商《归藏》、周《周易》。这三部卜书,是不让流传到民间的,当时,应该有具体的操作规程。

到了春秋时期,当时担任周王朝守藏史(国家图书馆馆长)的老子(李耳),曾经借工作之便,阅览过包括《周易》在内的很多原始档案资料,后以自己的聪明智慧,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——《道德经》。《道德经》活用了《周易》的文化思想精髓,演成了一部宇宙生成学说;又用《周易》的阴阳观念,结构了八十一章文体

模式，是一部达到了洁净精微、不染纤尘境界的哲学著作。

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在东周国都洛阳写成后，随即在诸侯国间流传开来，鲁国的孔子曾得到鲁王的资助，风尘仆仆到洛阳向老子请教关于礼乐治国的大事。此后不久，周王朝为争夺王位发生内讧，战争爆发，王朝的档案散失，《周易》遂流传到民间，而孔子到五十一岁才阅读到《周易》这本书。孔子到了晚年，更加喜欢读《易》，历史记载说他曾“韦编三绝”（穿《易经》竹简的牛皮筋，被翻断了三次）。孔子没有留下关于《易经》的著作。

到了战国，才有了注释《易经》的著作，据说，当时在社会上流传有七种注解文字，合计有十篇，名叫“十翼”。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《周易大传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 《彖(tuàn)传》(分上下篇)：64条，解释64卦的卦名、卦辞。
2. 《象传》(分上下篇)：450条，其中64条解释64卦的卦名、卦义；386条解释386爻。卦名、卦义都用“象”为根据，所以叫做“象传”。
3. 《文言》：分别解释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的卦辞与爻辞。
4. 《系词》(分上下篇)：论述《易经》的义蕴、功用、筮法、八卦起源等。
5. 《说卦》：说明八经卦的象。
6. 《序卦》：说明64卦的顺序。
7. 《杂卦》：错乱说明64卦的卦象、卦名。

《易大传》是东周人用自己的思想观念，对《周易》原文所做的哲学的解释，其中有相当多的地方，与原文意思有出入。（至今还有少数人认为《易大传》是孔子写的，多数学者否定了孔子作《易大传》的说法。）不过，它的影响很大，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人著书立说，都在引用《易大传》的说法，不少人一开口说《周易》，实际上就是在讲《易大传》。《易大传》的作者，为了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，还发明了很多操作术语（阴阳、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卦象、卦位、爻象、爻数等概念，这都是《易经》经文里边所没有的新东西）来解释，这样一来，原本一眼就看得懂的卦爻文字，反而变得晦涩难解了。更有甚者，《易大传·系辞上》的作者，发明了用蓍草演卦法，扑朔迷离，神乎其神，更与《易经》原义相背离。

汉朝人发明了“爻辰”、“卦气”、“纳甲”等技术术语，将《周易》视作阴阳灾异算命之书，到了三国魏时，青年易学家王弼一扫汉朝人解易的方法，不过，他仍采用《易大传》的哲理观点，再加上《老子》学说，来注《周易》，面貌虽为之一新，却没有脱离旧窠，还是以哲理解释。（后人笼统认为王弼是一扫象数，其实并非如此。）此后，王弼《易注》成为解释《周易》的两大主流之一。迨至唐代，孔颖达编纂《五经正义》，遂以王弼《易注》为正本。宋代解《易》蜂起，北宋五子各执一说：洛阳的邵雍创“先天易”，陕西的张载创“气易”，湖南的周敦颐创“太极易”，洛阳二程的程颐创“伦理易”，至南宋朱熹则全用卜筮来解释《易》。清人李光地将程颐、朱熹两家合编为《周

易折中》，作为儒学教本。两千年来，注《周易》的书越来越多，数都数不清，都是一家之言。当你读了一本以上有关《周易》的书以后，你会发现每本都有相当多不同于其他本的解释。可以说，读的本子越多就越糊涂起来。最后反而茫茫然莫衷一是了。为什么一本不足五千字的《周易》原文，会有那么多的解释呢？谁也找不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，每本书的作者都认为“我的解释是接近原意的”，倘若都这样说的话，那得出的结论便会是都不符合原意了。

历史上曾经有“诗无达诂”的说法，也就是《诗经》从来没有完全通达的解释。《诗》为“五经”之一，《易》也为“五经”之一，所以，《易》也就没有一定的解释了。其实不然，只要追根溯源，还是可以找到正确答案的。

《易经语法分析》打开阅读《易经》之门

我是有意对《易经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，才下了一番功夫写《易经语法分析》的。

我是教省重点高中语文课的。该校在河南省一直是应试教育的典范，升学率极高，“文革”后更是如此。为了适应这种教学模式与形势的需要，我在语文课的教学上下了一番功夫。语文课向来被视为工具课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根据自己的教学体会编制了一套“语文课五步连贯教学法”。把识（识题结构，知文章体裁）、读（读课文，释词义，析层次）、问（问问题，师生互动）、答（答问题，师生互动）、总（总结段落中心、文章主题思想、写作特点）这五个步骤融会贯通在一堂课中。虽然是师生互动，却以学生为主。为了实施这一教学改革，我把当时从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文汇总起来，作了不同类型的排列组合，从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，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律（例如从题目的语言结构可以看出该篇文章的体裁、中心和范围等）。随后，我把“五步连贯教学法”中每个步骤的内容和技术要求总结成文，作为阅读钥匙，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学生，因此，在课堂教学中，学生占了主动，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，一堂课轻轻松松上完，效果相当可观。究其原因，就是重视课文的词法和句法的分析，也就是说，我一贯把汉语语法教学渗透到每篇课文中去。高中语文课既有现代文又有古文，运用语法教学，不但现代文容易解决，即便是难度较大的古文，只要能熟练地掌握汉语语法技术，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。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与技术的掌握是学好语文课的关键。

我继续徜徉在高中语文汉语语法教学的当儿，也正是《易经》大热的时候，我被卷入到了学《易》的大潮中，先读经文五千言，再读古今各家注释，各种注解五花八门，莫衷一是。冷静思考之后，我发现几乎所有的《易经》注本，都不是从语言的角度去讲解的，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难读的局面。为此，我不自量力，很想下一番

功夫,恢复《易经》经文的本来面目,就跟我教高中学生一样,做一点有益的工作,能够使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,都能够读懂《易经》经文。对我来说,这不过是扩而大之的自我加码而已,从另一个角度讲,也只不过是我的语文课汉语语法教学的延续罢了。当然,我认识到这是一件比教学工作更加严肃而艰巨的工作!

为达此目的,我利用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,夜以继日地翻阅了我所能看到的全部参考书,下面这些专家学者的话更加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念:

“从商代的汉语那种质态,经过了三千多年的渐变,产生了现代汉语的这种质态……语言的发展是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,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。”“语法是具有很大的稳固性的。数千年来,即有史以来,汉语语法是变化不大的;它靠着几千年维持下来的某些语法特点和以后发展出来的一些特点,以自别于其他的语言。词序的固定是汉语语法稳固性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。主语在谓语前面,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前面,数千年如一日。动词的位置在它的宾语的前面,这一条规则在上古不完全适合,但也可以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有人分析过甲骨文的语法,发现它的词序和现代汉语的词序基本上是相同的。在上古的全部典籍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事实。”(王力著《汉语史稿》[修订本],第1页,第211页,中华书局,1980年6月新1版)

语言是许多时代的产物,它的发展是采取渐变的、传承的方式,也就是从旧语言过渡到新语言,不用消灭旧语言建立新语言的方式,而是用扩大和改造旧语言构成要素的方式,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。

从汉语的历史来看,现代汉语远在宋元时代就已经粗具规模。我们从清代曹雪芹的《石头记》(《红楼梦》)可以看出汉语两百年来没有多大变化;从明代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里可以看出五百多年以前的汉语也基本上同现在一样。我们再从宋元语言依次往前看,就会知道宋元时代的汉语同前代汉语的关系,正像现代汉语同宋元时代的汉语一样。可见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语是几千年逐渐发展传承的结果,并不是突然新生的东西。

汉语语法主要是用字序(词素的排列顺序)、词序(词的排列顺序)和虚词来表现构词、造句以及各种语法意义的。这个基本特点是古今汉语语法所共有的,是汉语语法稳固性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。在这个基本特点的支配下,许多具体的语法规则也是大体相同的。(张静、张珩《古今汉语比较语法》(修订本)第6—8页,河南人民出版社,1979年4月第2版)

基于上述这种语法观点,来看待三千年前的《易经》经文,无疑是一把标准的衡量尺度。我想后代对《易经》经文所产生的重大认识分歧,主要在对于具体文字的理解上。而书面汉语在时间上,虽然跨度很大,但变化却是很小的。尤其是从语法角度来衡量,古今汉语除了极个别的现象外,几乎都是相同的,既然有了相对容易

把握的标尺,那么,《易经》语言文字理解上的分歧,也就相对容易地趋于一致了。

《易经语法分析》的内容,虽然有五个部分,而重点是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。语法中实词与虚词的判定,实词中词性与词义的确定,都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的,有的是一眼就看出来了,而有的还是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确定下来的。从中可以看出《易经》时代的单音词最多,复音词较少,这是语言发展的规律。不过,就语言本身所表述的事事物物来说,在当时也够丰富多彩了;书面文字的出现,足见华夏民族在其成长的过程中,文化与文明也够辉煌灿烂了。

《易经》中有一个常见的词“无咎”,其出现频率高达 93 次,通常的解释是“灾”或“灾害”,没有人提出过疑义。但是我分析之后,发现这种解释不恰当。因为《易经》经文中有直接说“灾”的:

1. 《无妄·六三》说:“无妄之灾:或系之牛,行人之得,邑人之灾”;
2. 《小过·上六》说:“弗遇过之,飞鸟离之,凶,是谓灾眚”;
3. 《讼·九二》说:“不克讼,归而逋,其邑人三百户,无眚”。“眚”也是“灾”的意思。

据说“灾”的内容有二:一为水、火、荒旱等所造成的祸害;二为个人的不幸遭遇。这都是指人群或个人所遇到的特大损伤事件而说的。

然而“无咎”一词在《易经》行文中的表述正面的有:“吉无咎”(共 12 例)、“贞无咎”、“利……无咎”、“有孚……无咎”、“元亨利贞无咎”;反面的有:“厉无咎”、“吝无咎”、“凶无咎”、“艰……无咎”等等,正面的说法之后绝对不会出现“灾”,而反面的说法之后,一般也不会出现“灾”,因为这只是预测出现一种反面现象之后的情况,最严重的莫过于“凶”,它本身就是最严重不过的“灾(祸殃)”了,再在后面加了一个“无咎”,能否说“出现凶灾”之后“没灾”呢?这是讲不通的。所以说,把“咎”说成“灾”,确实是言之过分、表义不当了。根据这些具体的语言环境,“咎”应当解释为“过错”(正面表述的)、“过失”(反面表述的),都是以名词来理解的。另外,《易经》里的“无”字,是否定副词,根据古代汉语的词法惯例,否定副词后面的名词,都必须变为动词,也就是“咎”要变为“有咎”。“无咎”用现代汉语解释,就是“没有过错”、“没有过失”的意思。这样,对《易经》93 例“无咎”一词的理解,就通达无阻了。

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词法中的四个否定副词:弗与勿,不和毋(无)。我国汉语学家王力先生在他所著的《汉语史稿》中,特别提到了这四个副词的性能和用法,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援引《易经》经文的例子,却引用了后《易经》至少五百年(春秋末至战国)的著作,实属遗憾。现在我把《易经》中的例子举出来,以便观览和欣赏。

“弗”与“勿”,是一般性否定和禁止性否定的分别,在谓语的中心词是外动词(及物动词)的时候,“弗”和“勿”所修饰的外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。王力先生通过“弗”与“勿”所属语音部位的分析,否定了“弗等于‘不之’的合音”与“勿等于‘毋之’的合音”